

# 冯梦龙政治思想历程研究

庄莉红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冯梦龙是明末著名文学家, 他的文学成就离不开他政治思想的指引。冯梦龙的政治思想历程主要可分成3段: 出仕前、寿宁县令任上、离任回乡。这也是他政治上从丰满理想到骨感现实, 并从实践中加以总结升华的过程, 尤其是晚明政权风雨飘摇的末期, 他在治国、治军和理财的主张很有见地, 可惜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政治上的不得志, 让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也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动人的思想光芒。

[关键词] 冯梦龙; 政治思想; “三言”; 历程研究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5) 03-0085-08

## 一、引言

冯梦龙(1574—1646), 字犹龙, 别号龙子犹, 又号墨憨斋主人, 是晚明时期博学卓识的通俗文学家。他一生中编著甚富, 尤以“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最为脍炙人口。由于他的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sup>[1]</sup><sup>7</sup>, 赢得了广大读者, 因而蜚声文坛。

冯梦龙不仅是文学家, 而且是有远大理想、有政治才能的地方官, 是忧国忧民、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志士。关于后2个方面, 知者甚少。1988年, 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 “到寿宁县调研, 他突出推崇两个人, 一个是冯梦龙”<sup>[2]</sup><sup>8</sup>。“那段时间, 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sup>[3]</sup>。“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 一路翻山越岭, 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 他写了个《寿宁待志》, 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 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 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sup>[3]</sup>。可见“三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影响, 他肯定了冯梦龙作为县令造

福寿宁一方百姓的政绩, 也肯定其爱民思想与政治才能。之后, 人们才注意到冯梦龙还有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 但对其政治方面的相关研究非常少, 目前, 知网检索到的只有1994年陶青硕士论文《冯梦龙的政治思想》及2021年程慧琴等人编写的《明末循吏冯梦龙》一书有所涉及。因此, 本研究结合冯梦龙的生平, 探索冯梦龙如何以一个文学家特有的气质去参与政治, 又如何某些方面突破一般文学家常有的局限, 在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

## 二、冯梦龙出仕前的政治理想

### (一) 怀抱利器而不得用

冯梦龙出身儒士家庭, 从小受到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熏陶。他抱着儒家“匡时济世”的实用目的去攻读传统文化典籍, “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他世界观的核心。他在2篇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中说:

然则两家祖父教做人必学王先生孝者, 政学其定省中塞天地、横四海有用之孝也<sup>[4]</sup><sup>172</sup>。

往予与三瞻读书西堂也, 盖《靴靴编》初行后, ……而雍瞻则雪跨霜悬, 总角片语, 夺尽前辈名家扇簪; 虽予当年剑气弓声, 不敢略割韩

[收稿日期] 2024-04-08

[作者简介] 庄莉红(1970—), 女, 福建惠安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闽台文化、公共关系学及笔迹心理学等研究。

彭右地,实有孙伯符英雄忌人之顾,非徒以暮出端门,苍满洛阳,发燕公年位可致之叹也<sup>[4]177</sup>。

这里不免有些自夸,流露出当时的年少气盛,其作为政治理想不能不说是空泛的。这在封建社会中受儒家正统观念熏陶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例外,但他毕竟与一般单纯追求个人名位者不同,这从他的治学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凡读书须知不但为自己读,为天下人读即为自己;亦不但为一身读,为子孙读,为生生世世读。作如是观,方铲尽苟简之意,胸才宽,趣味才永<sup>[4]182</sup>。

这是他后来教育学生的话,可见青年冯梦龙的政治抱负虽然比较空泛,但相当真诚,甚至还带着某种神圣的光辉。

如果他的思想领域仅限于儒家经籍,那他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代圣贤立言的腐儒而已。一方面,他对于儒家经籍并没有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怀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加以取舍,他公开说过“经文亦可删而读矣”<sup>[4]180</sup>;另一方面,他将视野扩大到一些野史笔记中,像《太平广记》这种篇幅浩繁的小说总集,他也“自少涉猎”<sup>[4]57</sup>,因喜其博奥,厌其芜秽,故为之芟繁就简而成《太平广记钞》。所以,青年冯梦龙没有完全受到儒家教条的束缚,思想相当活跃,他能领会生活的真谛。正因为这样,他的才学见地才能在同辈人中鹤立鸡群,受到推崇。他的友人李长庚就曾经折服地说:“友人冯犹龙氏,近者留心性命之学……功在学者不浅。”<sup>[4]60</sup>

青年冯梦龙要实现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理想,首先要在地主阶级政权中获得一个稳定的地位,但是,在科举制度面前,这一愿望自然是要碰壁的。他科场失意,怀利器而不得用,因而,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到了社会的不平和道路的坎坷。他在怅惘愤懑中度过了青年时期。

但他对前途并没有完全失望,他还想通过科举之路厕身当权派的行列,希望能有明君和贤相识英雄于草莽、拔寒士于泥淖,他后来在“三言”中所写的《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穷马周遭际卖鲙媪》,未必不是这种思想的流露。

## (二) 寄情文学大放异彩

愿望毕竟不是现实。现实是冯梦龙直至中年

犹“困诸生间”<sup>[4]177</sup>,这对一位“抱有用之才”又“极其多情善感的热血男子”<sup>[5]</sup>来说毕竟是难堪的。他没有李贽那种冲决思想罗网、把神圣的权威和教条视作草莽、做出独特概括的理论家的勇气,就只能在生活上做些消极的反抗。他在青楼中寻求精神和情感的暂时慰藉,他曾出入艳冶场,并和名妓侯慧卿相爱。但是这样的情感寄托只能起到麻醉的作用,不可能长久,他的寄情声色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恼。他也曾借着评语流露这种痛苦的心情:

放达自废,胸中磊块,借此散之,歌以当泣,君子伤焉!<sup>[4]91</sup>

在本质上,他的政治理想是严肃的,他的伦理观念也是严肃的。所以,后来失去慧卿,他悲痛欲绝,从此绝迹青楼,并不是偶然的。

在政治上失意之时,冯梦龙那艺术家的灵魂便活跃起来,他在意识形态上就有点不拘礼法了。在47岁到61岁这一时期,他更加发愤著作,脍炙人口的“三言”正成书于这个时期,这是他一生中文艺创作的丰收期,也是他的朋友梅之煊所谓“不得志则托诸空言”<sup>[4]22</sup>的时期。但其实空言不空,它寄托着作者的深厚用意。

冯梦龙早在读书阶段,就积累了大量历代政治家从政的经验,也搜集了大量文学创作的资料。从皇帝治国到文臣辅国、武臣用兵,以至文学逸事、朝野奇闻,他无不浏览积累,中年时期成书的《智囊》《智囊补》《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书,可以说就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分类整理加工而成的。他才华横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是,我们只要对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些综合分析和探索,就不难发现冯梦龙即使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主要志趣仍在积累历代政治家从政的经验,他考虑问题的焦点是当权者如何使用权力的问题,即所谓的“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他像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总是从政治权力执掌者的品行、政策来考虑国家的兴衰,这有他比较肤浅的一面,但他不是空谈家,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所追求的是将理想付诸实践,哪怕是一些不太深刻的政治见解,他都以身体力行为荣。61岁时他远离家乡来到偏僻的福建寿宁,就是出于这种愿望。

### 三、冯梦龙出任寿宁县令时的政治实践

崇祯三年（1630），冯梦龙补了岁贡，后任丹徒训导。崇祯七年（1634），从丹徒训导擢升寿宁知县。在这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三言”及其他笔记、小说的著作、编纂工作，成为远近闻名的通俗文学家。即使如此，他还是愿意离开“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千里迢迢来到寿宁任职。自然，这不能用一般官瘾来解释，而应该看到他可贵的实践精神，年已耳顺的冯梦龙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了寿宁。到任的第二天傍晚，他看见“黄云朵朵，自西而东，良久忽成五色，最后变为红霞，生平所未睹也”<sup>[6]69</sup>。这种自然界常见的云彩变幻，经他那带着醉意的眼睛一看，就有点神秘之感了。他不禁喜而赋诗：

出岫看徐升，纷纶散郁蒸。莲花金朵朵，龙甲锦层层。似浪千重拥，成文五色凝。不须占太史，瑞气识年登<sup>[6]69</sup>。

他非常自信地描绘了这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景，得出了“瑞气识年登”的结论。这首诗，寄托着他对仕途美好前程的展望，表现了他莅任之初实现政治理想的信心和奋发进取的精神。

#### （一）莅任之初的“仁政”理想

到任后，他把在《智囊》《谭概》等笔记小品中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的从政经验，都尽量贯彻运用到寿宁县的政治实践中。他致力于把理想化了的政治权力偶像化为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他在《智囊》中记载过：

赵清献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皴痂冻裂，或以小罪，终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吏无敢妄系一人者<sup>[7]33</sup>。

这当然不是一种正常有效的做法，在思想方法上不免绝对化。在冯梦龙当政之时，要按这种绝对化的标准执行司法权力，恐怕不会有良好效果，他未能清醒地认识到他追求的那种理想化了

的仁政，在那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力求将这一极不现实的行政经验付诸实践，这是他文学家气质的表现。他在《寿宁待志》中写道：

县少重囚，故无监、铺之分。狴犴一区在二门之西，偏北三间亦号重监，南二间则曰轻监，余添造一间，不令重加于轻，然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sup>[6]6</sup>。

他这种轻刑、力图不重监以至空狱的政策，能否与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相互兼容？这样的疑问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冯梦龙所处的那个时代，明王朝的统治基础摇摇欲坠，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原各省，即使寿宁一带阶级斗争还未显得那么尖锐，但是连年用兵，地方财政压力加重，这时冯梦龙要实现“狱无系囚”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

另一例是他曾在《智囊》中用理想化的笔调描述过的仁政偶像：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sup>[7]19</sup>

撇开邵雍反对新法的反动立场不谈，这个偶像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给老百姓以实际好处。这种思想不管多么主观、多么肤浅，但是，在冯梦龙当知县时，也还是尽可能地付诸实践，他在论及寿宁县令好不好当的时候写道：

肘掣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其情亦多有凄愤而不敢控者矣。虽然，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sup>[8]88</sup>。

这虽是一种小修小补，但是他当了父母官，总算把青年时期追求仁政的理想和中年时期搜集的为政经验，都尽可能地贯彻于行政实践中。

#### （二）重赋之下的恩威并施

很快地，些微政绩带来的沉醉感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唤醒了，当时统治者无限制地增加赋税、徭役，加重了寿宁人民的负担，单崇祯四年（1631）就“加派”赋税“四百廿一两九钱九分一厘”<sup>[8]22</sup>。很多都图的图民无力缴纳粮赋，只



好一欠、二抗、三逃。《寿宁待志》坊隅、福安里、政和里这样描述:

民稍顽,粮难……民顽,粮欠……民极顽,欠粮、拒捕、盗牛、唆讼<sup>[8]77</sup>。

积欠不偿,一逃自脱<sup>[8]19</sup>。

这时的冯梦龙就不能再片面地、绝对化地谈轻刑、谈实际上废除镇压的空话了。他不得不借助于儒家仁政宝库中的一服“妙药”,这药方早已记在《智囊补·诸葛亮》的按语中: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sup>[7]4</sup>

这才是儒家仁政的实质,儒家所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的宽政轻刑,他们所追求的是宽与猛的适当配合,孔子公开说出这一点,就不像单纯谴责苛政猛刑那样肤浅、那样虚伪了,那种单纯夸耀“狱无系囚”的言论,只能供天真的文学家、史学家作精神寄托;而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却需要脚踏实地,所以,他在《寿宁待志》中写道:

为有司者,别风气之淳顽,而雨露不得不济以雷霆;察户口之肥瘠,而催科不得不参以抚字,此旧志之缺,必当补载者<sup>[8]63</sup>。

冯梦龙感到单纯强调仁宽有缺点,应该纠正补充,不能一味讲宽,要恩威并施,一张一弛,既有雨露一样的恩,也有雷霆一样的威。他很明确地提醒自己,要以严厉的办法防止农民起义,还得减轻赋役,让农民吃饱肚子;精简文牍手续,使百姓不受侵暴。具体说就是:

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猷牒,可使无讼<sup>[8]88</sup>。

他在任上,确也扎扎实实办了不少好事,如减轻赋税和劳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陋俗、整饬学风、兴利除害。此外,他还捐俸以修建学堂,施药以济病民,设阱除灭虎害,在权责范围内,他的确实现了尽可能有利于民的夙愿。虽然他那安邦定国的大志未能完全施展,但他的清廉政绩,仍然得到后人的承认。

清康熙年间修纂的《寿宁县志》称冯梦龙:“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sup>[9]</sup>这当然不是溢美之辞。与他同时期的文学家徐燊称他:“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

先生;而令之才,亦无逾先生者。顾先生虽耽乎诗,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sup>[8]14</sup>徐燊是明末闽中名宿,其藏书之富,可敌王侯。他如此推重冯梦龙,可知当时冯梦龙的文誉官声为人们所称道。

### (三) 地方肘掣下的情法幅窘

尽管冯梦龙兢兢业业,想在知县任上干一番事业,无奈生不逢时,他的轻刑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设想,不为明末的官僚制度所容。加以他既非进士出身,又不会逢迎拍马、拉帮结派,因而得不到上司的青睐和僚属的支持,于是有的条陈被驳回,有的施政设想为下属所抵制,这使他深感到“肘掣于地方,幅窘于资格”<sup>[8]88</sup>的痛苦。在《石门隘》一诗中,他似乎流露了这种郁郁寡欢之情:

削壁遮天半,扪萝未得门。凿开山混沌,别有古乾坤。锁岭居当要,临溪势觉尊。笋舆肩侧过,犹恐碍云根<sup>[8]4</sup>。

诗写山城古隘之险峻,但字里行间似有所寄思。这“遮天半”的“削壁”与“居当要”的“锁岭”,使人们联想到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那窃居高位一手遮天的权奸。“笋舆肩侧过,犹恐碍云根”,也正是宦途艰难的真实写照。

而最使冯梦龙内心感到痛苦的,是他的爱民思想与知县职务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泽民与忠君的矛盾。他原以为这个僻处山区的小县城,以自己的才识,尽可以施行一套清明政治。这种情趣、操守,明显地反映在《戴清亭》一诗里。诗曰:

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sup>[8]8</sup>。

诗人要与老梅同清,“标冷趣”正饱含着冯梦龙的深深自许。他以清官自命,也处处以清官律己,但他处于知县职位,上司要求于他的是善于制服与聚敛,而人民希望于县太爷的却是简政、轻刑和薄赋。他目睹人民在苛捐杂税重压下的悲惨情景,作为一个善良的文学家的冯梦龙,这时不能向执行镇压职能的地方官的冯梦龙让步了,因此,他写下了一首《催征》诗,诗曰:

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带青苍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

息，敷天颂圣恩<sup>[8]29</sup>。

冯梦龙在《智囊》中欣赏“猛以济宽”的主张，在《寿宁待志》中强调雨露与雷霆并施，认为“政是以和”乃至可达上下安定的境界，但当他的政治实践从空想的“仁政”理想走向现实，要求他拿出一定威力来把他的施政纲领贯彻到底时，他的思想矛盾就尖锐化了。忠君思想要求他善于以法制民，为上层统治者聚敛更多的财富；爱民思想又使他同情人民疾苦，不忍见“带青苍早稻，垂白鬻孤孙”的惨状。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伸法则情郁，伸情则法废。”<sup>[4]159</sup>在这样的矛盾中，他既没有像李贽那样在理论上无畏地前进、在某些方面突破封建教条而提出新的观念与命题的毅力和胆识，也没有力量冲破政治上的正统观念，这使得他的政治理想又一次遭受打击。如果说未到寿宁之前，他憧憬着掌握一县政权，以实现自己仁政的理想——“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sup>[10]535</sup>，那么，经过几年宦途生涯的实践，他已经认识到朝政腐败之至，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于是，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在条陈中深有感慨地写道：“卑职人微言轻，但能自律，安能律人？”<sup>[8]62</sup>

可贵的是冯梦龙有一股坚持不懈的精神。他虽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退却，但他并没有学“高人”“隐士”们逃避现实，更没有入山学道，而是更加正视现实。他思想当中空想、幻想的成分减少了，他把思想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思考着。

## 四、冯梦龙离任回乡后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不只是政治理想、政治意识或对政治感性经验的认知，而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理性化的深度认识和理论构建。冯梦龙出仕前的理想、寿宁县令时的实践，为其构建完整的、理性的政治思想描绘了远大的目标、奠定了现实的土壤，他才能在离任回乡后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形成完善的政治思想体系。

### （一）关于治国

《中兴实录叙》是一篇冯梦龙关于治国的政

治论文。叙言所揭示的崇祯王朝6个“可怪”，事实上就是指出其覆亡的根本原因，总结其失败的深刻教训；归根到底是从上到下的组织机构的腐朽。文章中提到：

先帝采言不废刍荛，任人辄委心腹，求治可谓急矣。然门户情面之垒，胶结不破，则依附有神梯；苞苴资格之局，到底不除，则贫贱无出路。狱因姑息而成滥，吏借箕敛以售贪。糜餉无稽，失事不罚。以此弭乱，不疑缓乎？今日流贼之乱，从古未有，然起于何地，纵自何人？炎炎燎原，必有燃始。当事者从不究极于此，其可怪一也。守土之臣，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死。今贼来则逃，贼退复往。甚则仓皇而走，仍然捆载而归，互相弥缝，恬不知耻，其可怪二也。兵不务精，以众相夸，纪律无闻，羈縻从事，官兵所至，行居觳觫，民之畏兵，甚于畏贼，其可怪三也。餉不核旧，专务撮新，奸胥之腹茹而不吐，贪吏之囊结而不开，民已透输，官乃全欠，其可怪四也。京师天府，固于盘石，游骑一临，不攻自下，百官不效一筹，羽林不发一矢，其可怪五也。衣冠济济，声气相高，脚色纷纷，跪拜恐后，举天科甲，千百之众，而殉难才二十人，其可怪六也。……别忠逆以励廉耻，一兵将以肃军容，诛贪墨以苏民命，严稽核以清课额，更鼓铸之令以足金钱，通南北之脉以招豪杰，如此而贼不平、乱不弭，未之有也。余草莽老臣，抚心世道，非一日矣，犹望以余年及睹太平<sup>[4]198</sup>。

这篇叙文反映了冯梦龙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目睹朝政腐败，主张自上而下地改革吏治，却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否定农民起义军，把希望寄托在福王身上。但由于他观察深刻和分析尖锐，客观上已经把矛头指向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尤其于用人一节，有感而发，特别深刻。显然，如果不是对历史和现状作过长期观察研究的人，是写不出这样一篇深刻的论述的。正像他自己讲的：“抚心世道，非一日矣。”<sup>[4]198</sup>这可谓深有体会而发，不仅切中时弊，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 （二）关于治军

冯梦龙的治军论述较集中于《甲申纪事叙》。这篇文章是关于甲申之年（1644）的政治时事，记载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

京、崇祯帝自缢、大臣和宦竖以及百姓在这政治大变动中种种不同的表现。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冯梦龙大喊“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不忍纪亦不忍不纪”<sup>[4]191</sup>。他呼吁福王小朝廷的大臣们:“此百尔臣工,所不仰体震衷,同心戮力,及是时而明政刑者,非人也。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急,舵师揖手,兢兢业业,协心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闲诟谮乎?”<sup>[4]192</sup>他采取这一立场,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他在记述中表现出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是应该肯定的,而他所提出的立军政的思想,更值得人们重视。他说:

而余更有虑者,在军政之未立。夫军政之未立,若无兵也;有兵而若无兵,而其害甚于无兵<sup>[4]192</sup>。

针对这一问题,他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意见。略作归纳,这就是:

### 1. 量饷招兵。他认为:

古者用兵,宁使饷浮于兵,不使兵浮于饷。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丁壮则为奴仆。……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馘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良可痛已<sup>[4]192</sup>。

这一段既是对“立军政”极有见地的建议,更是尖锐而大胆地揭露了明末兵贼残害人民的情况。冯梦龙对兵贼之危害深有感受,早在他编“三言”时,就常常将批判矛头指向残害人民的兵贼。如在《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里,就揭露了严世蕃爪牙杨顺“搜获避兵平民,将他剃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的罪恶。《甲申纪事叙》中所论,可以说是冯梦龙几十年间耳闻目睹、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认识。说的是军政,但其容量已不只是军政,而是触及到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皇权本质。

2. 提倡将士“国而忘家”。他首先指出兵士携带家属之弊:

兵既有家属,势不能草居露宿,于是占民间之居,用民间之物。兵富而民贫,兵乐而民苦。才一征调,则又有安插家小之说,拣择瘠肥,迁延月日,……兵之恋恋家室如此,即使驱之赴敌,亦内顾之意多,而进取之意少<sup>[4]193</sup>。

他还举出几个古代著名将领国而忘家的例子以对比:

汉霍去病曰:“匈奴犹在,何以家为?”宋刘锜赴官东京,行至顺昌,闻金人东下,遂敛兵入城为固守计。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古名将国而忘家类如此<sup>[4]193</sup>。

短短一篇论述,既有对当时军队状况的调查了解,又有对古代治军历史的研究,切中当时军队之积弊。提倡将士国而忘家,轻装上阵,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3. 先足食,后足兵。冯梦龙吸收了孔孟论政论兵的观点,提出了以下一些带有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的理论。他先征引孟子的“与民守之,何必兵”和孔子的“先足食,次足兵;及不得已而去,则先去兵”的言论,然后举出当时几次战守以及兵变的例子:

且昌平之乱,由兵而不由民;淮扬之守,由民而不由兵。京口一留兵,而即有西门焚禾之惨;金华一招兵,而即有汤溪破城之变。兵之为害,历历可见<sup>[4]193</sup>。

并进而指出“兵反为害,不若去之”<sup>[4]193</sup>,这是激愤之语,是出于对遭受兵害的百姓的同情,明知其不可行而言之,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文学家的义愤和偏激。

总之,他的军事理论,有积极的部分,也有空想的因素。但不管怎样,一个71岁的“草莽臣”,能提出这一套军事思想,企图用以解决他那时代的一部分社会矛盾,眼光和勇气极为可嘉。

### (三) 关于财政

冯梦龙关于理财的理论,集中于《钱法议》,这是一篇很有见地的研究货币问题的论文,其中几个观点颇有独到之处:

1. 币值的稳定与否和政权的巩固与否是成正比的:“钱识帝号,其制之美恶、价之贵贱与世之安危相应。”<sup>[4]194</sup>他的论据是:

国朝自洪永而下,钱皆精雅……终敬宗、神宗之世不变,而享国长久。……至崇祯钱出,而司铸者未暇急公,先谋润橐,……而价因以大减,今每千止三钱五分矣。新钱既贱,旧钱不得独贵,藏钱之家,十而亏七;用钱之人,三而当



一，民安得不日贫，而国用安得足乎？且帝号至贵重也，而轻之薄之贱之，可谓非乱征与？<sup>[4]194</sup>

把稳定货币与巩固政权相联系，这观点近似于唯物主义，可见，他从实践中已觉察到财政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观点的确是很新颖的。

2. 货币欲取信于民，发行与回笼之数应当相等。

盖钱法之行，全在上下相通，收散相等……使下散一价，而上收又一价，则民不服；使散者金富捭派，而收者勒捐作难，则民怨苦。有一于此，求其通行无滞，不可得矣<sup>[4]195</sup>。

针对时弊，他还提出了钱币流通与回笼的具体办法。

钱价既立，凡民间纳粮者，必令银钱各半，纳赎则谷与钱并收。银以供上输之正额，钱以充支销之杂费。如此则钱居必用之势，上铸之下所必买，下积之上所必收。出入画一无二价，上下流转无穷期<sup>[4]196</sup>。

冯梦龙作为一个在野的“草莽老臣”，不仅关心政治时局，还关心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向福王小朝廷提出了这一颇有见地的《钱法议》。这些建议，是否为福王所采用，不得而知，但从这些论文立论的精神，论据的确凿可靠，完全可以印证他本人所讲的“抚心世道，非一日矣”的说法，而且他这些关于钱币发行、流通与回笼问题的探讨，也很值得后代理财者引以为鉴。

#### （四）关于反清复明

冯梦龙最后的一部著作《中兴伟略》，是为反清复明制造舆论的。

《中兴伟略》者，为南北变故而辑也。我太祖高皇帝逐胡清华，三百年来，文治日久，武备废弛。官军眼眼相觑，贪生怕死，是以致虏寇两犯神京，震惊皇陵。莫大之惨，莫大之冤，恨不咀其肉而灰其魂矣。途闻吴总兵三桂、洪三边承畴，矢志恢复，合谋杀虏，辅弼新主登极。此反虏为明之策，莫大之勋，莫大之泽。泄三百年不剖之冤，此人人共快，万姓欢呼者也。闽中南安郑伯芝龙，同诸故老元勋朱公继祚、黄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监国，固守闽广一隅。诏谕昭明，招纳贤士，待天下之清，协扶幼主，中兴大务，恢复大明不朽之基业，在兹举矣<sup>[11]</sup>。

从这段内容看来，《中兴伟略》应写于清兵攻下南京、福王被执、唐王监国于福州之后。“引言”的反清复明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当时由于战乱，道路阻隔，传闻失实，冯梦龙竟将误传的吴三桂和洪承畴合谋反清复明、辅弼新主的事信以为真，因而感激涕零，大力赞颂。但也有可能明知并无吴、洪复明之事，而有意以讹传讹，借此以鼓舞人心，号召人民起来反清。这段话还表现了冯梦龙的正统观念，他心目中的“新主”该是指崇祯的子孙；看来他并不赞成唐王即位，而只是期望他固守闽广一隅，待天下平定后，扶助幼主，以中兴明朝。这可以说是一篇反清复明的宣言和号召书，表现了冯梦龙这位72岁老人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

## 五、结 语

一个从来不为当权者重用的文学家、地方小官，却怀抱着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以大半生精力，收集了历史上政治家从政的经验并亲自实践，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包括治国、治军、财政的政见，这在文学家中的确是相当罕见的。以冯梦龙的宏才大志、博学卓识，若是生逢其时、臣逢其主，他肯定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干才。由于朝政昏暗、用人不当，本是栋梁材，冷落路旁栽。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转而寄情文学，而他在文学上的很多进步见解，又得力于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积极探索和深刻理解。他终于在文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席位。

冯梦龙集政治家的志向、器识与文学家的气质、风度于一身。“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sup>[12]</sup>这是司马迁对循吏的画像，也符合冯梦龙政治历程的实际，他的朋友钱谦益用“晋人风度汉循良”<sup>[13]</sup>来概括他的才识和气度，应该说这个论断是有见地的。它触及了冯梦龙思想的根本特点，那就是一方面像遵守法度的循良汉吏，在政治上依然奉儒家匡时济世、辅国安邦的思想为圭臬；另一方面像

魏晋文人那样,在意识形态上离经叛道、不顾理法(这方面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政治上的保守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叛逆性,矛盾地统一在他这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矛盾有时代特点,在明末不是个别现象。在政治上,他又不像凌濛初那样狭隘,自然又不如李贽那样彻底,能够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观念和惊世骇俗的命题,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实干精神,甚至在明王朝大局已去的情况下,他还孜孜以求地将思想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都作了一番考察、分析。他的思想领域比一般文人广阔得多,他对社会弊病剖析的深刻性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皇权不可侵犯”的正统观念,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统治阶级上层。他的思想犀利而切实,在批判现实中,放出了异常动人的光辉。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sup>[2]315</sup>冯梦龙的文学成就及其政治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政治精神是涵养党员干部学习的优秀品质,富有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冯梦龙. 全像古今小说: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2]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宁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 [3] 编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J]. 共产党员, 2016(11): 55-58.
- [4] 冯梦龙. 冯梦龙诗文[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 [5] 盐谷温.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M]. 孙俤工,译. 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29: 510.
- [6] 冯梦龙. 冯梦龙全集:万事足·邯郸梦·寿宁待志[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 [7] 冯梦龙. 白话智囊补:上[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8] 冯梦龙. 寿宁待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9] 赵廷珣. 清康熙寿宁县志注辑·卷之四[M]. 北京:线装书局,2013: 169.
- [10] 冯梦龙. 全像古今小说: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11] 冯梦龙. 中兴伟略·太霞新奏·笑府[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1.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099.
- [13] 冯保善. 东吴畸人话说冯梦龙[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49.

## The Political Thought Journey of Feng Menglong

ZHUANG Lihong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Feng Menglong was a famous literary fig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were inseparably linked to his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efore he entered public service,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magistrate of Shouning County, and after he left office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These stages represent his political journey from rich ideals to stark reality, and his summariza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se experiences in practice. Especially in the turbulent late Ming Dynasty, his views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military affair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were insightful but unfortunately were not valued or adopted by the rulers. His political failure gave him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life, and also gave his literary works a moving intellectual radiance.

**Key words:** Feng Menglong; political thought; San Yan; evolution study

(责任编辑 陈蒙腰)